唐明华《大风歌——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

真实反映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历史贡献

□张 陵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日子里，有一部报告文学值得一读。那就是作家唐明华的《大风歌——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这部作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非凡的思想勇气，直面中国民营经济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讲述了许多民营企业家创业的艰辛故事，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旗帜鲜明地为中国的民营经济鼓与呼。在当代报告文学的创作中，这样全面肯定中国民营经济历史，这样高度评价中国民营企业家贡献的作品，还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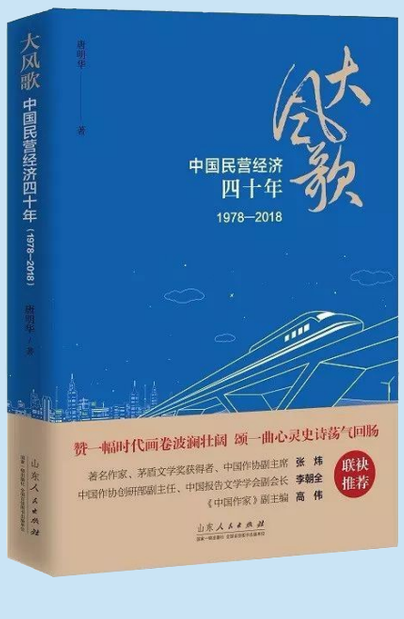
读《大风歌》，一定会让人首先思考这部作品的历史观。回想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说到底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进步，都可以看作是不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过程。解放思想，就是破除改革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进步的生产关系，改革调整束缚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关系，当然包括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关系。解放生产力，就是充分释放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能力和力量。中国民营经济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人民群众在“文革”后的一片经济废墟上展开自救，从而创造新生活的必然要求，就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就是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精神的“初心”。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才能深刻认识中国民营经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血脉关系。《大风歌》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层面上展开描述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构筑作品的立意、提炼作品思想主题，最终抒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心灵史诗。由于作品坚持了正确的唯物史观，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解读那段历史的一把钥匙。

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为什么中国民营经济能够在40年的历史中，由一些个体经营、个体生产、个体劳动发展成今天实力强大的经济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在各个领域最活跃的力量，成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成为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成为中国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大风歌》通过一个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民营企业发展历程和企业家的创业故事，深刻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并提出了思考。可以说，作品的思想基础是厚实的，立意是稳妥的，主题的深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风歌》思想深刻性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没有回避时代的矛盾冲突，客观记录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创业的艰难困苦，真实展现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产儿怎样在艰难中生存壮大，怎样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怎样参与改变着中国和世界。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岁月里，民营企业生存艰难。这里所说的艰难，不是一般创业意义上的辛苦，而是指所有个体经营者都面临的合法性的困扰，都必须能够为合法生存进行斗争。虽然改革春风吹来了，但体制上政策上甚至法律上文化上的冻土却远远没有消融，社会墒情还远未具备创业种子发芽的温度与湿度，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冒着违规违法的风险去寻找生存空间。结果，不断付出沉重代价，生存环境的恶劣，生存斗争的艰险可想而知。

作品正是在时代创造的典型环境中，写出了中国第一代和后来几代企业家们的奋斗史，写出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塑造出了具有时代精神品质的中国企业家的报告文学形象。他们在领执照、开饭馆、做小买卖、异地贩运、办小企业的时候，只知道日子过不下去了，得想办法生存。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朴实的生存法则，居然隐含着新旧无限的和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创造了财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社会生活，改写了中国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最辉煌的时期。作品里写到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不过，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关村那批打破和告别铁饭碗，勇敢投身民营经济海洋的知识分子。中关村最早从电器一条街发展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大本营，打造成中国的硅谷，其间的故事非常惨烈、格外悲壮。中国知识阶层参与民营经济，意义是历史性的。没有知识的介入和引领，中国民营经济的格局和品质就无法提高，就不可能高速和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站到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作品的主题紧扣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写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命运，挺立起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动群像，突出了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当中的一些先进人物，作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当之无愧。文学作品应该为他们唱出时代的大风之歌。

《大风歌》主题的深刻性还在于一方面理直气壮歌颂民营经济，一方面不回避民营经济在其充满生猛活力的发展中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引发我们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今天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给社会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对传统社会形成了挑战，造成了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的危机。资本力量越强大，贫富差距越大，造成的社会精神危机就越严重。进而言之，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财富引发的社会问题负有责任。特别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中，人们发现，一些地方的严重政治生态和塌方式腐败，都有许多民营企业在违法乱纪。由此，便顺理成章地把民营经济推上社会道德的审判台。显然，民营经济在为国家民族积累财富的同时，还要承受道德审判。这个矛盾看起来很突出尖锐，很容易把我们的思想带入误区，应该澄清。其一，个别民营企业家的问题不能与民营经济的本质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违法行为就否定中国民营经济的性质，更不能否定民营经济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其二，从中国社会现状来看，从现在到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里，民生问题仍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解决民生问题永远是第一要务。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不是民营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领导经济建设还存在的矛盾和不协调的问题，是执政能力和水平如何提高的问题。因此，这部作品从民营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记录和见证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相当艰难的。从作品描写中关村一条街的命运，写广东企业家在雇工问题受到不公正对待以及民营经济的一些具体问题，都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批示解决等细节不难看出，民营经济的问题都反映在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上。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也是民营经济发展40年，更是我们党探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领导经济其中包括领导民营经济的40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加强和提高，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因此，能够正视也有能力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用治国理政的有效措施来支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民营经济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遭遇新的挑战。就在我们呼唤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时候，《大风歌》的问世，可谓非常及时。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艰难历程的文学档案，作者的担当意识和家国情怀令人尊敬。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温暖与诘问

——刘仁前作品浅论

□郑润良

“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正在文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经由这一概念，人们才注意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中、苏北平原里下河地区涌现了以复出文坛的汪曾祺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地域特色与审美趣味方面具有相当多的共通性。作为这一概念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之一，刘仁前功不可没。文学重在创新，但也要注重传承。刘仁前一直以传扬汪老的文学精髓为己任，致力于打造以汪老为旗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而刘仁前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消化汪老作品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在散文、小说创作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汪曾祺在当代文坛是一个传奇。他的作品上承现代京派文学、抒情文化小说的流脉，改变了新时期文坛的整体格局，对后来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尤为独特的是，汪曾祺作品能够让不同年代的读者喜欢，让人百读不腻。刘仁前的文学之路是从学习汪曾祺作品开始的。1980年，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一时风靡全国，引发无数文学青年的膜拜。他的《故乡的食物》等散文作品同样以淡然清新的风格赢得读者的喜爱，这些“汪迷”中就有汪曾祺的乡邻刘仁前。在《迟到的怀念》中，刘仁前曾说，“我们一路读着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一边追随着自己的文学梦想。”这种追随和学习无疑是有效的。因为审美趣味、乡土气息的接近，刘仁前很快把握住了汪曾祺作品的精髓，写出了极为纯正的“汪味”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发表于1987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陈建功在点评中指出，“这位作者的另一点可贵之处是，他开始意识到，要写出‘味儿’来了。比如作品中那远距离的叙事态度，不是确实有了一种冷隽的观照的‘味儿’吗？”陈建功读出了刘仁前作品中的“汪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面渗透着作者对一种叙事调子的追求。不过，这种叙事调子怎样才能更加独树一帜，以区别于汪曾祺的某些小说呢？大概这也是作者正在思索的突破方向吧？”时年26岁的刘仁前就以其作品浓厚的“汪味”给评论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刘仁前对汪曾祺作品风格、精髓的领悟和把握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1992年由汪老亲题书名的散文集《楚水风物》出版，并于2017年对《楚水风物》进行了全新创作，刘仁前奉上了20多年来对汪老的深切怀念，为此笔者曾撰文《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楚水风物》中的文章与汪曾祺著名的散文《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物产非常接近，用笔风格也极为相似。可以说，《楚水风物》中刘仁前对故乡风物的描写在语言上对汪氏风格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他和汪曾祺一样，喜欢在作品中呈现“风俗画”，对故乡风俗、食物、花鸟虫鱼了如指掌，对家乡风物习性的把握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因而涉笔成趣、天然如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作品与汪曾祺的散文相比，不仅是形似，更有神似。汪曾祺对故乡风物的描写往往以回忆的视角而写，带有浓厚的对故土、亲人、少年岁月的热爱，着力在作品中营造“和谐”之境，抒发其“人间送小温”的审美理想。刘仁前对“楚水风物”的描写也大都以其童年时代以及年轻时经历的“大集体”时期的人情事物为背景而写，对里下河过往风情的追溯中所展现的不仅仅是里下河乡土风情，同样以醇厚优美的人伦世界的书写夺人心魄，令人怀想。故而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一时一地的风俗人情事物，却又能超越具体的时空，给人恒久的审美享受，引发不同地域时空的读者的共鸣。

2005年，刘仁前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写出了长篇小说《香河》。《香河》全景式地刻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下河乡村的生活图景，正如评论家丁帆所言，“在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百年文学史中，能够用长篇小说来描写苏北里下河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者，刘仁前算是第一人。”“香河”这一虚构的人文地理，随着这本小说的广泛流传，越来越形成一种真实可感的时空范围，并具有里下河文学精神上的普遍指向意义。我曾在《抒写俗世的温情——里下河小说之我见》中将里下河小说定位为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在我看来，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叙述焦点是抒写俗世的温情。汪曾祺认为作品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并自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汪曾祺看来，生活是很好玩的，俗世是充满了欢乐与温情的。即使有苦难，也要用快乐、柔韧的心去化解它。汪曾祺的这种审美理想与审美趣味在刘仁前的《香河》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香河》虽然把大部分笔墨放在70年代这一特殊的政治时代，但笔下人物并没有大善大恶，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仍然洋溢着水乡特有的温情与善意。这与汪曾祺先生以回忆性的视角追溯旧日故乡乌托邦式情景的小说《受戒》等作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汪曾祺一样，刘仁前在《香河》中追求的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一种和谐的审美境界。

《香河》之后更有《浮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残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构成了完整的《香河三部曲》。《香河》写的是后“文革”叙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和《残月》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里下河。后两部小说，在叙事背景和表现手法上，可谓是对汪曾祺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它们更加关注一体化时代背景之下，乡土人性的蜕变。《浮城》里柳成荫的官场沉浮，《残月》里柳永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乡村伦理对他们两代人的影响，他们的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其实都是暗含了对经济大潮之下乡土人性的诘问与诠释。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前的诸多乡俗以及乡村伦理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刘仁前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其中时代的快速发展与里下河乡村精神世界之间的某种矛盾，《浮城》和《残月》表现了在时代的喧嚣之下，那些打破旧有规则的具有一定反叛心理的乡民，他们人性的挣扎，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体现，是时代进步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与《香河》一以贯之的是，《浮城》与《残月》同样抒写了里下河人灵魂的秘密、存在的乐趣与艰难，还有作者对故乡的回望以及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但是，刘仁前在《浮城》与《残月》中发现某个“平衡点”，它建立在宽广、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生体验上，平衡着区域性、共同性与深刻性的关系。在《浮城》与《残月》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当下的时空相连，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小说世界，它既有乡土经验、童年经验，同时还能够在乡土生活的变迁及其对乡村伦理形态的影响下，找到时代与人性深处的审视坐标。

随着《浮城》和《残月》的问世，我们看到刘仁前不仅继承与发扬了汪曾祺等人奠定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更是通过完整的《香河三部曲》等作品不断发展和丰富着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涵，也预示着里下河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在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扩大叙述容量和表现空间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二是表现空间从乡村向里下河地区都市转移。《浮城》《残月》将叙述焦点转移到对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境遇情感变化的书写，经由官场、商场、情场交织的复杂场域写出了欲望化与商品经济时代人心的浮躁与残缺，与《香河》呈现的淳朴、宁静形成了一种对比。《香河三部曲》是汪味小说和“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的集大成者，是传承，也是一种新的发展。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主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刘仁前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创作积淀。我们相信，他不仅会继续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壮大呐喊助威，更会以自己新的创作成绩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文学书写视阈及前瞻

黄秀萍《江南雪》新世纪劳动者

□喻 彬

刊于《中国作家·文学》2018年12期的中篇小说《江南雪》，是隐退文坛20多年的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黄秀萍的新作，这是近年来鲜见的一部讲述底层打工妹命运嬗变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打工妹生命价值的自我觉醒与挣扎，以及20多年后命运的蜕变与升华。

综观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文学，绝大多数都是以打工者对个体生存和命运而忧思为主题。这种带有本能动因的写作所呈现的打工世界，就像一个铁皮鼓，外面总有一些为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鼓槌”在拼命地敲，里面的打工者在封闭、喧嚣、昏暗、弥漫着汗臭与荷尔蒙气息的空间里互相挤压、彼此冲突、寻找出路，对生存焦虑，对命运堪忧，为未来挣扎等内容，成为早期打工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

而《江南雪》则不同，它着力塑造了三个打工妹历尽挫败、迷失与寻找之后对生命价值的重构与蝶变。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我”（何芳洁）与刘丽娜、小青三位打工妹，同在一家港资手袋厂打工。身为仓管员的何芳洁，因不屈于工厂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压榨，为完成父亲定的一年上交5万元的任务，以及心中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学梦想，毅然决然辞工。但现实是：只要走出了这家手袋厂就会变成流落街头的“三无人员”，要面对治安队员的盘查，只要厂证、暂住证、身份证“三证”之中缺一证，就会被作为盲流人员遣送到樟木头收容所或粤北地区植树造林服劳役，甚至遭遇无良歹人的侵害。出厂时，何芳洁的厂证已经被厂方收回，随时都有被收容的可能，危机已经向她步步逼近。

可是，就在食宿无着的情况下，文学的梦想依然令何芳洁魂牵梦萦，在没有听到自己的小说被电台播出之前，无视自身生存温饱，不管明天寄身何处，何芳洁的未来只有文学和远方。这种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的龃龉、脱节和矛盾，不仅仅体现在“我”身上，也体现在现实社会那些身处困境为梦想而战的人们身上。在希冀与现实、期望与绝望的泥沼中悄然沉沦甚至默默消逝者不计其数。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三来一补”企业，多数生存环境恶劣。对于没有文凭和技术专长的普通打工者来说，都渴望走出为生存而挣扎的宿命。好在，何芳洁终于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童装厂剪线工的工作。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

当何芳洁的小说在电台播出后，她应邀参加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文学研讨会，面对那些衣食无忧的评论家、编辑、作家们侃侃而谈，她只盼着会议尽快结束，赶上开往工厂的最后一趟公交专线车，回去上班。因为请假来开会，会以旷工处理。何芳洁发言时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作为一名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打工妹，我最渴望，今天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不仅仅有你们这些文学界的权威名流，更应该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我希望他们通过我们的文字，听到我们发自社会底层的呼声！”

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打工者，辗转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历经劳顿与忧患。小说中“我”和刘丽娜是同乡发小，感情深厚，作为手袋厂生产主管的刘丽娜对“我”照顾有加，她是个聪慧漂亮、内心坚强的女孩。她们是家乡榕镇仅有的两个外出打工的女孩。刘丽娜胆大心细、眼力过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手袋厂老板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将工厂委托刘丽娜管理，这就使她掌握了市场和客户资源，自己开办了一家世界一线品牌手袋代加工厂。就在香港股市震荡、深圳楼市崩盘之际，她再次抓住机遇，化危机成商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面对传统制造业日渐式微，刘丽娜索性放弃对手袋厂的经营。丈夫让她赋闲在家享清福，可是年近不惑的刘丽娜却决定继续创业，发展美容养生事业。只身来到上海一家大型美容院做学徒工、保健师、讲师，三年后还在苏州创办了自己的瘦身美体旗舰店。可以说，打工妹刘丽娜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小说中小青这一人物也个性鲜明，当白姑娘把“我”的名字叫成“石灰头”时，小青举起喷雾电烫斗，提高嗓门警告白姑娘：“你以后不许喊她石灰头，她不可能永远是你的打钮工，她有可能是：作家！”其实，小青也有自己的计划，她家境贫寒从没有上过学。她冒着可能被白姑娘炒掉的风险支持“我”，除了由衷地尊崇斯文外，还想跟着“我”学文化。常在工余时间，小青拿着硬皮本、新华字典和“我”一起到海边或公园，请“我”教她读书认字、学习数学。“我”跳槽到另一家服装厂做文员，小青跟着我成了这家厂的大烫工。正如刘丽娜说的，“文学改变的不仅仅是你，还有我和小青！”

后来，小青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代地产经纪人。在小青的指引下“我”和刘丽娜接手的“烂”盘最终成了意想不到的财富。

小青命运的变化来自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并努力求变，实现梦想。

《江南雪》这种书写底层打工者生命价值嬗变的新世纪劳动者文学，与早期以失落、迷惘、焦灼、无奈、寻觅等为主要精神向度的打工文学有着本质区别。

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劳动法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第一代、第二代打工者都已经成为企业的主人，一如《江南雪》中的三位女性，他们都以主人公的姿态奋战不息，成为新时代劳动者的楷模。

当今的劳动者文学，首先在文本上基本改变了人们对早期打工文学粗制滥造、浅层呻吟的偏见。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流变，以新的审美向度观照人性明暗与美丑。再就是文学写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过去在打工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劳资对抗、主从博弈、同根相煎的矛盾关系不再成为主要叙述对象。更多的是对经历打工岁月洗礼之后的人物心灵成长的理性思索，对新时代劳动者生命价值和精神维度的关注。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文学，应该是一种放眼量、大境界的书写，一种有血有肉、有肝有胆饱含温度和质感的创作。所以，在新形势视阈下对劳动者形象的审美与塑造，对劳动者个体生存和命运的关注，是时代赋予新世纪劳动者文学的任务与使命。

宝安劳动者文学，在各级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作家》等报刊的关怀、指导和扶持下，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宝安这个昔日的中国打工文学的渊薮之地，如今迎来了劳动者文学的春天。在宝安区政府的支持下，为全国劳动者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树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

《江南雪》的作者黄秀萍就是深圳市宝安区作家，她说自己隐退文坛20多年后再次复出，主要缘于宝安区作家协会主席唐成茂的召唤。她的又一部新作《中国智造》即将面世。她表示，作为劳动者文学作家，她将会潜心创作出直指人心、激励大众的良心之作，来回馈这个美好的时代和人民。